

平实的社会史研究专著。作者凭借其扎实的史料基础工作,使得该书真正做到了“论从史出”、“透物见人”,避免了“主题先行”、

“以论带史”之类的弊端,称得上是一部魏晋南北朝社会史研究的力作。

《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读后

潘 斌

(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1130)

遍布城乡的祠神曾是宋代社会的重要景观,其信仰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然而由于近年来学术界对民间宗教的研究集中在经典文本和民间秘密教派、结社上,研究的时段又集中于明清,所以一直没有对两宋祠神信仰做专门研究的著作出现。皮庆生的《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一书弥补了宋史研究中的这一空白。此书于2008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洋洋洒洒三十五万余字,分正文和附录两大部分。正文中的绪论部分主要是对“祠神信仰”概念进行解释以及提出全书研究的具体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从张王信仰的兴衰考察社会变化与信仰演变之间的关系,第三章探讨祠赛社会的社会功能和组织形式以及与官方的差异性态度,第四章探讨宋代的各种祈雨方法和实践,第五章讨论祠神信仰的传播,第六章讨论祠神信仰合法性问题,第七章结论部分对全书观点加以总结,并重新检讨目前研究方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书末附录部分有《祠山事要指掌集》的版本及史料价值、张王信仰事迹编年、张王行祠分布表、两宋皇帝祈雨数据统计等。全书读毕,可知其主要特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书的研究视角独特。对于宋代

民间信仰的研究一直不是很多,原因除了文献分布零散外,还有就是研究者很难找到好的切入角度。对于民间信仰,学人习惯于叙述民间教派的历史、批判性研究各种信仰活动、介绍各种神灵的崇拜和各种祭祀活动等。近些年来,在西方人类学、社会史、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影响下,学者们开始从多个角度研究民间信仰与国家权力社会生活的关系,深化了对民间信仰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意义的认识。本书的直接研究对象虽然是宋代的民间祠神信仰,但是作者将它作为宋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来进行考察,探讨的不仅是整个唐宋大变革背景下民众祠神信仰的存在及变化状况,更是研究这种存在及变化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作者将宋代祠神信仰与宋代民族关系、土人群体的壮大、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变以及宗教世俗化与平民化的社会情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对于理解宋代祠神信仰的存在、演变有着重要意义。作者将宋代祠神信仰放在较大的社会史和政治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使宋代祠神信仰呈现出较大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意义。

第二,本书的研究方法灵活多样。作者在研究民众祠神信仰时,借鉴了其它社会科学,如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以及传播

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从而为宋代祠神信仰的综合性研究开创了道路。如在本书的第五章讨论祠神信仰的传播时,作者借鉴了传播学的一些观点。传播学认为,任何一项传播活动都必须具备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传者;作者认为祠神信仰的传播也是如此,必须有信奉者将该祠神信仰从一个地区传播给另一个地区的民众,其媒介或为语言,或为香火、祠神的塑像等。又如作者用传播学中的拉扎斯菲尔德模式对祠神信仰中传播群体进行了分析,从而使读者能较为清楚地看到祠神信仰传播中各种群体或力量的作用。

第三,本书考证功夫扎实,重视文献。作者定位本书更多的是历史学的研究,主要通过一些具体个案探讨宋代民众祠神信仰存在和演变的真实状况,因此作者将更多精力放在考实上。比如本书第四章探讨宋代的祈雨,作者首先介绍祈雨方法,各阶层、群体祈雨活动的真实情况,然后才结合相关研究分析其中的同异和流变,提出自己的解释。又如本书第五章关于祠神信仰传播问题的研究,作者先爬梳相关史料,勾勒出宋代祠神信仰传播的具体情况,再在此基础上分析传播动力以及时人的应对等。作者重视文献,信

而有征,所引用的文献资料涉及政书、文集、史传、笔记、碑文以及佛道二藏等。对引用的史料,无论是正史典制,还是文集笔记小说,作者都能加以综合运用,而不是过分倚重某一方面的史料。

作者在本书绪论中对先行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评述时,认为目前宋代祠神信仰研究缺乏思想史视角的介入,我们也看到作者在本书中为避免研究中的这一缺陷所作出的努力。然而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书中有些地方仍然需要扩展或深化。如在本书的第五章中,作者虽然讨论了宋代精英思想界与民众祠神信仰中越界现象的关系,但是其探讨的力度和深度似乎不够。作为宋代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宋代祠神信仰必然与精英阶层思想有着互动的关系,深入探究二者的内在联系,不但会让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更为全面,而且能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宋代祠神信仰这一古代社会文化现象。瑕不掩瑜,作为从多个角度综合研究宋代祠神信仰的著作,《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此书的出版,对于宋代民间信仰乃至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多视角综合性研究,都将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赵冬梅教授《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读后

刘云军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保定 071002)

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年代、地理、职官和目录版本学是治中国古代史的“四把钥匙”。其中宋代职官因其复杂多变,治史者尤其视为畏途。尽管

如此,从上世纪以来,仍然有一大批不畏艰辛的海内外学者如大陆学者邓广铭、龚延明等,港台学者如梁天锡等,海外学者如梅原郁等,孜孜致力于宋代职官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